

2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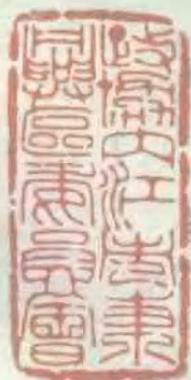
東江市
區文史委員會

文史資料

第二期
(总第十八期)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专
辑



四川省
乐汉市
文史资料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专辑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专辑



第二期
(总第十八期)

编 审：林汉良
傅长楠
余洪儒
编 辑：刘兆火
张 林
封面题字：李代权
封面篆刻：黄隆俊

内江市东兴区文史资料
第二期（总第十八期）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委员会编
内江市东兴印刷厂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印刷
图书准印证：内市（91）字第163号

目 录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 我在长征中 胡文斌 (1)
魂系利城
 廖释惑、傅宾旸、黎光谦、张继文烈士
 朱安华 (7)
中共内江工委党校的前身——地干班、农干班、
 党训班 陈文虎 (19)
抗战时期党在曾氏祠联兴小学的活动简况
 刘宗承 王远成 (24)
关于廖划平前半生的一些情况 刘宗承整理 (28)
内江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回顾 田文彬 (36)
活捉匪首海东 蓝 利 (55)
东街子建党训练班
 走访马金辉部长 张先贵 (60)
五十年代拥军优属工作的回忆 莫树德 (66)
党指引我走革命路 刘正喜 (79)
革命路上不停步
 纪念党成立七十周年 刘正喜 (82)
走上革命之路
 内江青年赴渝参军和壁山剿匪点滴 欧梦高 (83)

漫记下放劳动锻炼	林汉良	(88)
内江县在大办钢铁中组建的木炭支队	江清源	(104)
石大观县长的传记	张加驰	(108)
忆内江市东兴区植保工作之发展	牟富刚	(112)
内江县科普协会的建立与发展	王光槐	(116)
内江种猪	张素芳	(127)
忆内安公路的修建	王朝纲	(131)
忆内江县氮肥厂的兴建	蓝俊奎	(136)
内江制糖生产建厂话今昔	刘宗礼	(143)
一九七六以前集贸市场管理的回顾	张开俊	(153)
十二个老社的前前后后	刘雅南	(158)
回忆两河口水库建设	刘亲贤	(167)
记内江县水泥厂的兴办	蓝代发	(172)
在史东乡的所闻所历	史鳌法	(175)
内江县永福信用合作社的创办经过	王远成	(186)
回忆内江县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甘利荣	(189)
记建国初期内江县农村冬学的兴办	甘利荣	(194)
翻身农民热心办学一例	熊宣虎	(199)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在内江市东兴区各界人士纪念辛亥革命

八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正喜	(203)
内江“同志反正”	蓝 炯	(206)
一个外国人记录下的内江辛亥起义	白 马	(213)
朱章甫其人及其罹祸	世 杰	(215)
辛亥革命前后的内江中学堂	黄世杰	(223)

- 黄埔军校原内江县籍同学录 如然辑 (228)
汉安诗词丛话 洪庐辑录 (232)
- 重要更正** (247)
《内江市东兴区文史资料第一期》勘误表 (248)

我在长征中

胡文斌

我出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四川省安岳县一个偏僻山乡。父亲为了谋生，撇下高龄的祖母、二十多岁的母亲、我和不满两岁的小弟，一去再没回来。家里老小四口，靠种点地维生。家里没牛，我和小弟在前面当牛拉犁，母亲在后面扶犁，我们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披星戴月地编篾活来换点杂粮，经常满手是血口子，这仍不能糊口。16岁那年，为了躲壮丁，也为了谋生，我告别了亲人，离开了家乡，只身从安岳长途步行到川西北茂汶羌族自治县那深山老林里挖药材维生。在那里我听到了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便和一些挖药青年一道，自愿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部队保卫科填表登记后，我被分配在一二九师七七〇团直属队警卫连，当时师领导是刘伯承、邓小平，团长是张才干，我在团直作首长的警卫员、通讯员。从此，我跟着部队和首长走上了革命道路。

红军长征的道路，都是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偏僻、荒凉的地方。当时，红军没有固定收入，自然无固定给养，都是走到哪里，就向那里的老百姓开条子借粮，同时将打土豪缴获的果实，一部份分给贫苦百姓，一部份留作为部队给养。数九寒天，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身上穿的却很单薄。有时也穿点从地主豪绅那里缴获来的花花绿绿的衣服，

我那时就穿过花棉袄，只要穿上能挡点风寒，什么质量、式样都不在乎。脚上穿的是我们自己打的草鞋，还常常连草鞋也没得穿，打光脚板走路。冷得实在不行了，就在脚上包些破布或烂棉花什么的。宿营时，我们一个挨一个地躺在潮湿的草地里过夜。

我们翻过了二郎山，接着又爬大、小夹金山。这些山，又高又陡，风大、雪也大，旋头风里夹着鹅毛大雪。山上的雪终年四季不化，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难受。在雪山上还特别觉得累，出气困难。再冻再累，中途都不能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只能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往上爬，因为一但停了下来就再也起不来或走不动了。这些雪山上，气候变化无常，冷热一变化，头上就要结冰。有个老炊事员同志，因舍不得抛下为同志们做饭的锅，被风雪刮下雪山牺牲了。过雪山途中牺牲了我们很多的同志。

我们翻过一座座雪山，又走一望无际的草原。粗看起来，是一片茫无边际的大草原，实际上它是一片坑凹不平的、从来没人走过的原始大草原沼泽地。这里的草，历来自生自灭。沼泽地上，长了一层层的草，上面的草不断的生，下面的草不断腐烂后变成那恶臭的腐质黑水，脚踩在草面上，草下面的黑水直往上面冒。我们没日没夜地行军在草地里，困了就蹲下来背靠背地坐一会、打个盹，这就算睡了觉、休息了。有的同志一歇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有的同志一脚踩到了下面有深坑的草地而陷了下去。

过草地的生活十分艰苦。渴了，就捧点水、捧点雪吞下去。在草地沼泽里，黑水也一样往肚子里咽。有时一连走几天都没有吃一点粮食。那些地方长着很多榆树和一些安不上

名的野草，经医务人员鉴定，只要毒不死人的能进口的东西都吃。草地里没柴，就用牛粪烧，用盆煮，没有盐，只能吃白味。往往还等不到这些草叶、树皮煮熟就吃了。到后来，几乎踏上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连草根、身上的皮带都用牛粪烧来吃了，最后连朱德总司令等首长的马都忍痛吃掉了。经过二十多天的艰难跋涉，兄弟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继续前进了。

我们红四方面军在分裂分子张国焘的带领下，在这片茫茫的草原沼泽地里，往返走了三次。第一次好不容易过去了，可张国焘闹分裂、闹独立，要另立中央，把我们这支部队又拉回去，第二次返回草地。

我们第二次返回草地的时间大约是一九三五年九、十月份。路上，我们掩埋了第一次过草地来不及掩埋的同志们的尸体。这些同志多半是身体本来就差，在草地里长征没吃没穿拖垮饿死的，有的是陷到坑里而死，也有的是与敌人作战牺牲的。我们到达雅安、天全、芦山一带停下来，张国焘想以这里为根据地，建立他的独立王国。在第二年大约二、三月间，已到达陕北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与张国焘作了许多复杂的斗争，来电要求我们与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到延安会师，共图革命大业。当时，我们这支部队与敌人实力悬殊很大，张国焘根本无力独撑局面，只得听从党中央的要求，北上会师延安。在三次经过草地的一路上，又掩埋了第二次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们尸体。这期间，朱德、邓小平、贺龙、徐向前等首长和我们一起熬着，过着一次比一次、一天比一天更为艰难的日子。三次跋涉草地，可谓吃尽了苦头。

长征中，各级首长和普通士兵之间，战士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最为亲密的。我们不分什么官兵的高低，感情上大家是亲兄弟、姐妹一般。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谁没吃的了，同志们就把自己身上带的吃的拿出来分着吃，谁掉队了，我们就倒回去找，谁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互相搀扶着走。我那时就曾冒险救出过掉下坑的同志，也曾倒回去找过掉队的女同志，搀扶着她一起赶部队。我们团里的卫生员冯白洁同志，一路上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很多，我至今铭记在心。

长征途中，在与自然条件困难作斗争的同时，还得与敌人打仗，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从天上来上的飞机，地上的大炮。我们在与胡宗南军队和当时驻扎在西藏的印度兵打仗过程中，好些同志病倒了、牺牲了，我的左臂也被敌人子弹打穿，脚上中了几块小弹片，因当时没条件医治，弹片至今残留在身，有时还隐隐作痛。由于长征途中的伤病员日益增多，为不影响部队的行军打仗，首长不得已动员伤病员就地留下，由地方组织护理安置。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首长和同志们，也想到自己是吃苦惯了的，还能挺得住，愿意忍熬着前进，所以仍坚持请求首长同意我跟着部队一起前进，首长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在过草地时，毛主席因劳累过度而生病，实在不能走路时，战士们就背着走，我以后在炮兵团的战友大老金同志，当时就背过毛主席过草地。

我们部队经过的多是少数民族地区，做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藏胞的思想工作难度更大。藏民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期欺压和特务挑拨离间，对我党、我军误解很深，因而处处与我们为难、作对，这就增加了部

队的困难。经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对藏胞反复地深入细致地作宣传教育工作，讲清红军路经此地的目的，意义和纪律，得到了藏胞们的谅解和支持。后来藏胞还给我们带路，使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那段少数民族地区。

在战争年代里，在困难条件下，红军的组织纪律十分严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也不能违犯，对违纪者的处理也是很严的。首长们首先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战士们也就自觉遵守纪律。我们团里，有个刚从国民党过来不久的领导干部，有天在行军路上，他叫我爬到路边一根柿子树上去摘柿子给他吃，我不答应，他就命令我去，我仍不从，我说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他便和我吵了起来，我还是坚持没有去摘。事后，部队首长一面表扬我做得对，一面教育我今后要注意方法和态度。

在第三次经过草地快要到达陕北时，首长告诉我们，说到了那边就有吃的了，要我们千万注意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因为我们的肠子已经饿得很细很细了，一下子吃多了会胀死的。到达陕北会师时，我军由30多万人锐减到两万多人。川北有一家四口人参军，到会师时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当时能活下来的多半是比较年轻的和身体好一点的。万里长征，红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以红军胜利而告终。

部队行军达到甘肃仪马关时的一天，警卫连指导员找我个别谈话，说根据我参加革命以来各方面的表现，和我对党的认识，叫班长何天吉、通讯员杨明富二位同志介绍我入党，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履行了入党宣誓等手续。从此，我更加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及责任。那时，军队里的共产党员还是极少数，党组织还是处于保密状态，党内组织生活都是

分小组进行，大家谈谈思想，讨论如何起模范带头作用。转眼间，自己已在党内生活五十五年多了。

文革期间，一位战友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长征中我们团的团长张才千那里回来告诉我，说老首长一看见我的照片就认出了我，还说笑道：“这小鬼还没死呀！”更使我欣慰的是，从这里我得知老首长还健在，老首长心里想的是长征中能活过来的人不多，能活到今天不易，我们官兵之间的感情仍是那样深切，我的心似乎又和老首长、老同志、老战友们从遥远的地方贴到了一起。

回忆起党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取得的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辉煌胜利，更加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展望未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必将获得圆满成功。

魂系甜城

——记廖释惑、傅宾旸、黎光谦、
张继文烈士

朱安榮

1930年农历7月24日凌晨。

坐落在甜城西林寺脚下的七郎庙，万籁俱寂，唯有一间狭小的屋里还灯火通明，彻夜不熄。突然，随着几声急促的敲门声，一群持枪的敌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捆绑了正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县委委员傅宾旸、黎光谦，同时翻箱倒柜，一阵折腾，搜出了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文件、传单和油印机等东西。其中有陈秋林（廖释惑的化名）向川南特委的报告，相继，廖释惑、张继文也不幸被捕。

廖释惑、傅宾旸、黎光谦和张继文被捕后，敌人软硬兼施，刑讯逼供，但廖释惑他们却针锋相对，宁死不屈，最后被残暴的敌人杀害于内江若虹桥侧，这就是内江历史上有名的“八·四”惨案。

这四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曾经走过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他们又是怎样聚集在一起，为党为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使敌人丧魂落魄的伟业？

出生贫困 向往革命

廖释惑，字维华，号硕和，化名陈秋林。1895年农历9月15日出生在内江城内一户铜匠家庭里。祖父廖学宽，原是农民，后来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小在一家铜匠铺里当学徒，出师后自己开了一个小铜店。廖释惑同胞兄妹共5人，他排行第二，幼年就读于廖氏南祠小学，从小爱学习，爱劳动，放学回家常帮父亲拉风箱或忙家务。以后在城内一家糖食铺里当学徒，以一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他在大哥廖华平（划平）①的指教下，利用工余时间刻苦自学。廖华平除指导他学习文化知识外，还经常将《新思潮》、《星期日》等进步书刊给他看，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廖释惑在大哥的培育下，不仅提高了文化知识，革命的思想也在心头萌发、生长。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新思想的激励下，大批爱国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的行列。这时的廖释惑也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毅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去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读书。

当时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指导大家学习《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随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廖释惑在这里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进步很快。1922年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②。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众革命斗争活动。内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廖华平等相继在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先后回到内江，发展了黎灌英、谢独开等人入团。1923年廖释惑从川南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内江，担任内江县教育科督学职务。是年2月1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组织成立，钟白勋为书记，廖释惑负责经济。内江团组织曾先后直接与团中央领导人施存统、邓中夏等联系。他们定期组织团员学习中央发来的《先驱》、《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展开讨论，并且将学习情况向团中央汇报。当时团组织的对外活动是改组学生联合会，设立贫民学校和青年讲演团，实际是开展革命理论的宣传教育。

1924年，黎灌英、廖释惑等人在县城太平巷杨家祠堂组织“读书会”，吸收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参加，定期组织他们学习《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结合实际，认真讨论，同时在大西街街头向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读书会”不仅起到了宣传革命理论的作用，还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后有7人成为共产党员。

同年秋，廖释惑在团组织的领导下，随同黎灌英、谢独开等人发动群众，对当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搜刮民财，为非作歹的“三九”（即内江商会会长林基九、团练局局长马祥九、浮桥经营收支所所长范承九）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清算。国民党内江县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和民众压力，不得不将“三九”关押。这次斗争，深得人心，大大地增强了

革命者的斗志。可是，内江县政府官官相护，狼狈为奸，不久便偷偷地将“三九”释放了。黎灌英、谢独开等人知道后，发动群众向政府提出抗议，但反动当局拒不受理。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官僚、恶霸互相勾结，坑害人民的罪行，也从反面教育了群众。

傅宾旸，字天良，曾写作冰洋。1905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出生于内江县白鹤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傅宾旸很小的时候，其父不幸被耕牛打死，勤劳贤淑的母亲邓氏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他。孤儿寡母，度日如年，这在宾旸幼小的心灵上已埋下了对黑暗社会的愤懑。

傅宾旸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困，无钱上学，到了11岁那年，才去唐银同老师家读私塾，三、四年后因无法交纳学费被迫停学。但傅宾旸一直坚持自学。1921年，在内江城里教书的二伯父傅尧轩见他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善待指点，前途无量。于是，将他带在身边随堂深造。1924年初，傅尧轩的学生邬寅初在白鹤场设馆教书。傅尧轩知道邬寅初为人正直、知识渊博、教学有方，就推荐傅宾旸去邬寅初馆就读。

是年冬，内江县民团中区副团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江地方团组织负责人黎灌英和谢独开在白鹤场举办民团干部传习所（又叫青年自治会），傅宾旸在傅尧轩和邬寅初的支持下，参加了传习所学习。学习中不论是政治课还是军事课，他都用心听，认真记，刻苦练，不仅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而且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傅宾旸善言词，会书写，一有空就不辞劳苦地帮助黎灌英、谢独开刻写教材，主动做公益事情，深受黎灌英、谢独开器重。并经黎灌英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傅宾旸在传习所结业后，受团组织之命，在高粱、川鹤、观音滩等地，积极发展农会会员，组织农民协会。他经常对农民说：“农会是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只有团结起来，给地主斗，给土豪劣绅斗，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傅宾旸的宣传有声有色，富有鼓动性，使不少农民懂得了革命道理，都纷纷报名参加农会。

黎光谦，又名黎用中、黎化名，1895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生于内江东兴镇蟠龙冲一个农民家庭。祖父黎正灿，在内江开设“天庆元”绸缎店，为人正直，好打不平，1899年余栋臣率起义部队经过内江时，被官兵堵截，他组织群众声援义军队伍。父亲黎继熙，一生以教书为业，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老师。

黎光谦兄妹6人，他是长子，4岁就随父念书。由于天赋聪明，刻苦好学，成绩列于诸学童之前。14岁辍学回家，一面帮人代课，找点零星贴补家用，一面坚持自学。功夫不负有心人，1913年，经友人推荐，考上了资中联师，毕业后，又回到内江附近农村教书。他为人正直，生活简朴，经常早去晚归。他最疼爱农家子弟，有时将仅有的一点微薄收入也要支援学生，使学生及家长很受感动，都称赞他是穷苦人的先生。

1923年内江团组织建立后，黎光谦深受影响，不久结识了黎灌英、谢独开、廖释惑等人，他们很快成知为己。在黎灌英、谢独开、廖释惑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和马列主义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向往革命。

张继文，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四军三师四旅机枪连连